臺大歷史學報第 61 期
2018 年 6 月，頁 1-16

BIBLID1012-8514(2018)61pp.1-16
2018.6.1 收稿，2018.6.20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8.61.01

「從帝大到臺大：重探史學研究的邊界」專號導言

呂　紹　理*

近年來歷史學與人文學科在高等教育中究竟該扮演何種角色、發揮何種作用，引發社會廣泛討論。在全球經濟波動、產業轉型、少子化與高齡化社會迎面而來的年代裡，歷史學與人文學科如何面對多重變奏的環境，實為現下亟需反思的課題。此外，網路資訊與全球化已然成為本世紀新結構，冷戰解體和區域再分工也重新衝撞民族國家的地理空間界線，氣候變遷更挑戰全人類的生存機會。新問題與新局勢已非原本單一國家或單一學科的知識所能回應，必須尋求多方合作協調與對話。統合、跨域、通識之說不斷被提起，新的知識框架隱然胎動。面對此一新挑戰，百年前締造的學術分科框架，事實上也到了必須重思改組的階段。

回顧歷史，往往是反思的第一步，也是籌劃本專號的主要目的。面對隱然胎動的新知識框架，既有的歷史學知識體系如何應對或承接，如何保留或換新？2018 年適逢臺灣大學創立 90 周年，值此周年之際，回溯 90 年前日本殖民政府將西方知識體系消化轉介至臺灣的起點，考析學術框架生成的條件及其延續改換之因，適為重探學術邊界的重要途徑，並可循此徑探索其與戰後學術的承接與轉換。

為此，本專號擬由日治時期以臺北帝國大學為基地所形成的現代歷史學，作為展開反思學科邊界與重組學科內涵的起點。反思知識結構、制度框架與外在大環境間的關係，是本專號的重要目標，希冀以此為基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E-mail: sorellu@ntu.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礎，重探史學研究的邊界，思索既有知識在範域內外發展新生的可能性。

近 30 年有關戰前臺北帝大與戰後臺大的研究成果已相當豐富，前行成果有綜合性分析日本帝國大學體制、臺北帝大成立過程、學生入學、教學研究重心、學生來源與訓練、畢業後出路、戰後承續與轉換等課題；或以教育史或機構史的視角，分析臺北帝大在殖民地臺灣成立的制度政策背景；或者以單一學部、學科為分析對象；也有專注臺北帝大與總督府南進政策之關係；或者由空間及建築探討臺北帝大的環境樣態；另有從比較視角，探討臺北帝大在整體殖民地高等教育中的共通性與殊異性；亦有成果將焦點置於戰前與戰後的承續與斷裂；此外也不乏為個別學者撰寫「學案」式的傳記，[1]這些研究都在制度框架上提供重要而豐富的面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所有的學術制度，既在形成一種知識的系統框架，而框架也勢必構築了特定的對象、方法、範圍；[2]換言之，上述

1 近 30 年來臺北帝大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列入註釋頗為繁瑣，故製作「近 30 年臺北帝國大學與戰後初期臺灣大學研究書目初篇」以為本專號附錄。附錄編排形式，大體按照上述各主題，共計分為 8 類。

2 學術與制度之間的相互關係，是知識社會學及知識社會史關注的課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極夥，Fritz K. Ringer 對歐洲，特別是德國及法國學術社群的研究為重要代表，主要作品有 *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 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 1890-193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Modern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 *Fields of Knowledge: French Academic Cultu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890-19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亞洲學術與制度互動的廣泛討論，則以晚近日本學界以「學知」的概念反思近代日本學術與帝國擴張之間的複雜關係，見山本武利等集編，《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東京：岩波書店，2006），全 8 卷。歷史學領域中，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從「客觀化」的視角檢視此一價值如何在制度及學術教育的具體行動中開展出美國史學專業，為重要開創之作；中文作品中較早的研究成果為劉龍心，《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本書特別關注現代大學出現後，「歷史系」如何形構專業化、學院化與客觀化的歷史（科）學，從而有別於過去的「正史」。而大學的設立又與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構過程關係密切，也與逐漸形成的學術社群如何建立學術內涵的努力有關，其中努力的方向之一，即藉由整理國故，試圖將傳統典籍消融於新的歷史知識框架之中。是以大學與研究機構（尤其是中央研究院）和形成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研究成果也都在描繪制度在學術、知識形構上製造「邊界」的作用。

我們該如何思考這些制度在知識、教育、研究上所形成的界域？如同本專號中陳偉智所言，要回答這個問題，過往成果提供了相當紮實的制度政策分析，但對於不同學術領域具體內容的邊界如何運作，以及因政權移轉對不同學術領域構成的衝擊和影響，則仍有待進一步的梳理。亦即制度結構下，知識邊界的形構與變化以及知識體系的繼受或斷裂，需要透過特定學術領域具體的經驗分析，才能得其實踐的面貌。收錄在本期專號的 3 篇論文，即是以具體的新興領域及研究者為主角，思考新興領域與知識邊界之關係的部分成果。這裡的「邊界」，包含了時間、空間、知識分類、專業分科的界線，也包含了大環境政經巨變下對學科體制造成的重組與重劃邊界的作用。換個角度來看，史學研究及教學中出現的新興領域，正好可對照出既有學術框架的邊界，是以關注「新興領域」的茁壯發展或萎縮，恰好是理解史學邊界及其變動的切入點。在介紹本專號各篇論文前，謹先簡單說明此一制度「界線」的一些特性。

臺北帝大成立於 1928 年，在此之前 10 年——1918 年公布的「大學令」，象徵日本因應歐戰前後世界變局而採取擴張高等教育政策的重要轉折點。這個轉折點包括：一、放寬認可官公私立大學的設置，前此設立的 5 所帝國大學以及日後設立的 4 所，被賦予「總合大學」的性格，而其餘官公私立大學則為「單科大學」；二、帝國大學原有的分科大學統整為總合大學中的各學部；三、講座及學科數擴張，經濟學部出現。[3] 講座制（*Lehrstühl*）的目的在「一科專攻」，賦予講座教授教導學生知識與帶領「研究指導」（即「演習」）的任務，藉此深化研究課題與能

業化、學院化的歷史學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此外，吳密察〈「歷史」的出現〉（收入黃富三、古偉瀛、蔡采秀主編，《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1-21）和陳弱水〈臺大歷史系與現代中國史學傳統（1950-1970）〉（《臺大歷史學報》第 45 期〔2010 年 6 月，臺北〕，頁 117-154），也都從制度與學術互動關係，分別針對臺灣史及臺大歷史系的教研進行專題和綜合性的分析。

3 天野郁夫，《帝国大学－近代日本のエリート育成装置》（東京：中央公論社，2017），頁 6、43-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力，並透過講座成立之專門學會，形成共同研究。講座制偏向研究活動的深化，但也有其對應為教學領域的分野，從學生角度來看，此一分野即是講座教授所開設的「專攻」。此外，大正初年開始，留學海外的日本學者返國任教，將西方大學自主及學習自主的精神帶入帝大，因而從大正四年（1915）起東京帝大開始蘊釀改革，包括引進德國「學修自由」的概念，將原有學年制改為科目制及單位制，考核方式也有所變革。[4]這個變革給予講座在其專攻領域中有比較多的學術發揮，專攻學生因學制朝向「學修自由」的科目制及單位制，從而使得「為國家服務」的大學，在學術及教學上有了相對較多的學術自主，甚至於大學與產業之間的關係也變得比官公部門更密切。[5]這樣的改革氛圍與數年後分別在朝鮮及臺

4 簡言之，大正年間改革前的東京帝大，學生學習採「學年制」，每一年學生只能修習必修的科目，由通論而至專論，循序漸進。評量學生以平時表現及學年期末考試二項成績為主，所有修習科目平均成績達 60 分以上，方可晉級，然有一科目未達 50 分則須降級，並且重修原年級所有科目。藉由此一嚴格考核，帝大畢業學生得以享有文官免試的特權。然而，學生只能修必修科目以及評量方式缺乏彈性，造成學生只追求教師給予的「正確」知識以求通過試驗，缺乏自主學習的精神，因而到大正年間廣受批判，從而取消「學年制」，改為與今日較為相近的「必修」、「選修」科目，每一科目有其相應的「單位」，即每一單位對應一定的每週上課時數，修畢並通過考核即可取得該科目的單位。例如，工學部必修科「數學」要上三個學期，但第一學期每週上 4 小時，第二學期 3 小時，第 3 學期上 2 小時，三學期都修完、通過考核的學生可取得 3 單位，以此類推，學生在修業年限內取得 40 單位以上即可畢業。文政學部則規範每週上課時數 3 小時為 1 單位（或 5 小時 2 單位），例如，史學科東洋史專攻要修「東洋史」8 單位，再加其他科目 10 單位，修業年限內取得 18 單位及語言課程即可畢業。因此單位制是每一科目（課程）上課時數的總合計算方式，與現行學分制上多少小時課即得多少學分仍有若干差異。見関正夫，《日本の大学教育改革：歴史・現状・展望》（東京：玉川大学出版部，1988），頁 37-46；天野郁夫，《帝国大学－近代日本のエリート育成装置》，頁 110-124；東京帝国大学編，《東京帝国大学五十年史》（東京：東京帝国大学，1932），頁 681-1092。

5 日本帝國大學是培養官僚、執行「國策」的知識生產單位，這個論點在戰後批判戰前大學體制時，獲得相當廣泛的支持。不過，也有學者從各種資料中，指出帝大訓練出來的學生，進入產業界的比例遠高於進入行政部門，因而主張帝國大學實為日本追求「殖產興業」現代化而建立的培養專門人才的機構。見 James R. Bartholomew, “Japa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Imperial Universities, 1876-1920,”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7, no. 2 (February 1978, Ann Arbor), pp . 251-2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灣成立的殖民地帝國大學之間有何關聯性？殖民地高等教育體制，是全盤複製日本的帝大系統？或者與殖民政府的政策更為接近？抑或者因殖民地的「邊陲」特殊場域，得以有不受帝國中心體制約範的某種「自由」？

前行成果似乎多半比較傾向接受以下的論點：作為殖民地臺灣唯一一所綜合性的帝國大學，臺北帝大承繼了日本帝國大學的諸多特性：官僚培養機構、因應「國家」（殖民政府）的需要進行學術與技術的研究和教育，最具體的表徵，即理農學部以熱帶農學研究為核心；文政學部則有反映日本南進政策的「南洋史學講座」、「土俗學・人種學講座」。收入在本專號中的 3 篇論文，則分別對應「南洋史學講座」、「土俗學・人種學講座」中的考古學，以及與「農學」和人類學相關之自然史（博物學）等 3 個領域，以擔任講座的學者及修習的學生為行動者，思考知識邊界和行動者在此邊界中的相互作用，也可再次檢證前述論點的周延性。過往研究也都指出，「南洋史學」和「土俗學・人種學」這兩個講座是當時所有帝國大學中全新的領域，因此，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殖民地會出現有別於帝國中心不一樣的新興學術領域，實是我們可以思考的。以下即以新興領域的視角，簡介本專號的論文。

一、新興領域：南洋史

周婉窈〈臺北帝國大學南洋史學講座・專攻及其戰後遺緒（1928-1960）〉的主旨，乃透過檔案文獻，重建南洋史學講座及其專攻的樣貌，還原該領域在戰後的遺緒與斷裂，以及學術傳承的重新連結，藉此釐清南洋史學在臺北帝大與戰後臺大的歷史位置。如同周婉窈及其他先前研究所言，創設臺北帝大的宗旨，不論理農學部或文政學部，均以臺灣、東洋、南洋為教學研究的中心，最能體現此宗旨的，莫過設於文政學部史學科中的「南洋史學講座」。周婉窈文中除了進一步釐清「臺北帝國大學」命名的經緯、講座制與學科、專攻之間的關係外，她的論文有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前行研究之處，在於不從教師的角度鋪陳南洋史的研究業績，而是利用相當豐富的檔案，勾勒在南洋史專攻中修課學生的學習狀態、畢業出路，因為這些史實才能回頭檢證臺北帝大設立南洋史學講座，究竟在多大意義上落實了創設臺北帝大的宗旨。透過庋藏於校史檔案的資料，周婉窈描繪出南洋史專攻學生的基本動態：他們在學時必須投入比其他專攻學生更多的時間學習荷蘭、西班牙文等必要語言，以便撰寫學士論文時能解讀和運用史料。學生畢業後的出路，1940 年以前的畢業生，以任職於圖書館、學校教諭教授歷史，或進入公部門的調查單位（外事部調查課、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算是與培養政府官僚的目標相近。唯 1940 年以後戰事吃緊，不少學生不僅未能完成學業，甚且被徵調上戰場，自此失聯。就此而言，即使幣原坦（1870-1953）出掌臺北帝大首任總長（校長）時，期待這所學校能成為「殖民者子弟教育」的機關，臺北帝大的臺籍學生也的確比京城帝大的朝鮮學生少許多，但是戰爭無疑摧毀了幣原坦當初的理想。在這個歷史情境下，只有在戰爭之前畢業的中村孝志（1910-1994）及戰爭期間未被徵調從軍的女學生張美惠（1924-2008），成為延續臺北帝大南洋史及臺灣史的兩柱香火。周婉窈也由檔案及回憶資料中，細緻地爬梳陳荊和（1917-1995）、卜新賢兩位分別受日本及中國東南亞史訓練的學者，他們原本可以在戰後與張美惠一起承續戰前南洋史的研究，卻因戰後政治氛圍與迫害，這個因日本在東南亞擴張而有的新領域，隨著戰爭結束而崩解。而將戰前南洋史研究接續起來的，卻是在體制外以自學之力並私淑於岩生成一（1900-1988）而斐然大成的曹永和（1920-2014）。

透過周婉窈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南洋史學講座既是殖民地臺灣總督府期待設立的學科體制，也被視為臺北帝大史學科的重要特色，唯就歷任講座教授的研究課題來看，並未與總督府的南進政策同調。對照葉碧苓的研究可知，總督府於戰時組織數次「南方學術調查」，南洋史學講座的師資幾乎未曾與聞；即使到了 1943 年南方人文研究所成立，擔任兼任所員的岩生成一，也只是持續進行自己原有的日本南方移民史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6]並無配合總督府政策需求而進行新研究課題。從這個角度看，南洋史學講座形式上是臺灣總督府南進政策的產物，但在此學科體制下的學者卻未依循政策進行其教學與研究工作。

從學術內在理路來看，臺北帝大南洋史學講座進行的研究內容是否只是日本史學界研究課題在臺灣的複製？或者有其殖民地不受國內學術主流束縛的新契機？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稍微對照戰前日本在這個領域的發展過程。戰前日本東南亞史的研究最初附屬在「東洋史」範疇中，開創性的代表人物，即為臺北帝大史學科東洋史學講座教授藤田豐八（1869-1929），他於 1917 年發表有關宋代市舶司的研究，為日本史學界對東南亞史研究的重要起點，藤田另一力作《東西交涉史研究：南海篇》則是極為紮實的地名考證成果。他的弟子山本達郎（1910-2001）繼承此一理路，並以研究鄭和航海及貿易活動著稱。由於第一代研究者實以中國史料為基礎進行東南亞的研究，因而在 1930 年代以前，日本史學界是以中國的「南海」或「南方」的視角看待東南亞。1942 年山本達郎就任東京帝國大學助教授，在東洋史研究室中另成立「南方史研究會」即為著例。在這個以中國史料為基礎的研究中，「交流史」或者「交涉史」為此一時期研究者關注的焦點。[7]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山本達郎雖被視為戰前日本推動東亞南史的先驅人物，但他受聘的東京帝大並沒有特別發展出以東南亞史為中心的「講座」。

由此觀之，藤田豐八於 1928 年出任臺北帝大史學科東洋史學講座，雖然相當具有指標性意義，唯他到任後不久，即病逝於東京旅次。接任他的村上直次郎（1868-1966）和後繼的岩生成一、箭內健次（1910-），則是脫離中國史料，試圖從西方（尤其是荷蘭及西班牙）的龐大史料中探尋非中國視角之東南亞史的重要轉折，臺北帝大因而成為戰前日本帝

6 葉碧苓，《學術先鋒：臺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2010），頁 173-305。

7 櫻井由躬雄，〈東南アジア史の四〇年〉，收入東南アジア学会，《東南アジア史研究の展開》（東京：山川出版社，2009），頁 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最重要的東南亞史研究重鎮。[8]村上直次郎對彼時日本南方史研究的重要業績，即在收集、譯注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龐大檔案，成為日後日本及臺灣研究東南亞史的重要基礎。其次，日本究竟在東南亞的歷史、社會與經濟活動中的角色為何？似為臺北帝大南洋史研究的重點之一。岩生成一代表作《南洋日本町の研究》即為回應此一問題的巨著，而箭內健次專研菲律賓華僑，看似延續先前中國視角，卻也廣泛運用西班牙的史料。戰爭結束後的 1960 年代，日本學界受到 John R. W. Smail「自律史」（autonomous history）的影響，開始注重由東南亞各國自身材料及歷史主體，而不是從中國、印度或西方史料及觀點出發的東南亞史，[9]因而與戰前臺北帝大或東京帝大南方史研究有截然不同的方向。周婉窈文中提到戰後臺大研究越南史的重要學者陳荊和，即是日本學界最早利用越南漢喃資料，探索越南史的學者，亦即陳荊和這位臺灣出身、日本培養的學者，實為「東南亞出發看東南亞」的「自律史」先驅研究者。從這段對照可知，臺北帝大的南洋史研究和戰後初期一小段的承繼，實有逸出當時日本南洋史學界研究理路之外，在殖民地自創新局的生機，只是戰爭及接續而來的政權更迭與冷戰，讓這個新的學術方向在臺大中挫 30 年。

8 櫻井由躬雄，〈東南アジア史の四〇年〉，頁 6-8。櫻井亦提及，除了臺北帝大史學科南洋史學講座外，1930 年代末期日本還有兩個與東南亞調查研究有關的機構，一是一橋大學前身的東京商科大學，二是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這兩個單位都與戰爭期間日本帝國對東南亞經濟發展、資源調查、情報收集的需求有關。此外，東京外國語專門學校開設馬來語、暹邏語、緬甸、菲律賓等語言教學，廣義而言，也可屬與東南亞有關的教研機構。

9 John R. W. Smail, “On the Possibility of Autonomous History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2, no. 1 (March 1961, Singapore), pp. 72-102. 日本方面對 Smail 論點的衝擊與回應，見菅原由美，〈インドネシア——植民地史観とナショナリズム〉，收入東南アジア学会，《東南アジア史研究の展開》，頁 42-56；另見池端雪浦編，《変わる東南アジア史像》（東京：山川出版社，1994），頁 5-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新領域：土俗學・人種學與考古學

周婉窈文中另有一課題值得注意，文政學部史學科的講座是由「東洋史學」、「土俗學・人種學」（1928 年設立）、「南洋史學」、「國史學」（1929 年設立）及「西洋史學・史學地理學」等 5 講座所組成。其中「國史學」、「東洋史學」、「南洋史學」等 3 項為具有招收學生的「專攻」講座，「土俗學・人種學」雖非專攻講座，卻是史學科 3 個專攻的學生必修科目。從訓練與教育學生的角度來看，史學科 3 個專攻都得同時接受類似今日人類學這樣的基本訓練，是與日本國內大學的史學科非常不同的設計。本專號第二篇由陳偉智撰寫的專文〈知識的接收——國分直一與戰後初期的臺灣研究〉，即是以「土俗學・人種學」講座中的考古學為對象，討論此一講座在建構臺灣考古世界中的角色。

土俗學・人種學講座於 1928 年設立起至 1943 年止，一直是畢業於哈佛大學的人類學博士移川子之藏（1884-1947）擔任。移川與中國第一個考古學博士李濟（1896-1979）同樣師承 Roland Burrage Dixon（1875-1934）。此講座中的移川和助教授宮本延人（1901-1987），以及先後任教於臺南高等女學校教諭及臺北師範學校教授的國分直一（1908-2005）等人長期合作進行考古挖掘活動。戰前國分直一並未在臺北帝大任教，戰後於 1947 年才以留用資格受聘為臺大歷史系考古學副教授。

陳偉智的論文，乃利用楊雲萍（1906-2000）在戰後初期提出「文獻接收」和「歷史接收」的呼籲作為觀察的軸線，透過庋藏於臺大圖書館國分直一文庫中的各種日記、田野筆記、教學筆記、書信及發表過的論文等資料，還原了戰後初期這段「知識接收」的過程。在制度上，這個過程涉及前述「講座制」改換為美式的「學系」制，原有的「一科專攻」的講座，名目上變為歷史系下的 5 個研究室，國分直一即受聘於臺大歷史系民族學研究室，利用課堂及餘暇，相當有意識地整理了日治時期人類學及考古學的研究成果，[10]一方面表現在他所留下的教學筆記，二方

10 國分直一在戰後完成的 3 篇史前考古論文，均由第一位畢業於史學科南洋史專攻的臺灣人張樑標譯為中文。可參考本專號周婉窈論文所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面則於 1948 年「臺灣省博覽會」中的「風土館」，有系統地呈現 51 年間日本對臺灣原住民的調查和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國分直一透過整理，點出臺灣先史時期及原住民文化可能同時具有來自中國南方與北方以及琉球和東南亞的多樣元素，然而當時來臺官員所懷抱的民族主義觀點卻將此多元觀點轉為單一的「中國源出」論。放在戰前東亞考古學的更大脈絡下來看，這個多元／一元的起源問題，也會與下一篇洪廣冀的論文有關。此外，相較於南洋史研究在戰後因人才星散而中斷，考古學卻因國分直一努力統整戰前業績，完成「知識接收」，順利地與中國考古學研究者接筍而得以延續。陳偉智的文章也提醒我們必須注意，戰後初期高等教育雖在制度上改易了日本帝國大學的規制，但個別學門的教研內容，卻必須仰賴許多留用日籍教師盤點其研究業績，以因應國府「知識接收」的需求。國分直一扮演的考古學知識「接收」不是唯一案例，其他各領域也有類似現象，那麼戰後初期臺大制度改易過程中，各領域知識接收的總體樣態為何？來自中國各領域的知識菁英又如何看待他們接收到的日本研究成果？這個課題，還有很多需要深究之處。

陳偉智論文中另一值得注意的討論，是國分直一在歷史系開授「考古學」強調的考古與歷史的關係。此一學理上的親緣性，卻在國分直一離開臺灣後，考古學隨即脫離歷史而另出新門。這也是戰後另一種學術體制的分立過程。臺北帝大時期作為共同必修的「人類學」究竟對當時帝大史學科學生的影響為何？則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

三、新領域溯源：19 世紀自然史

國分直一藉由考古器物梳理古代臺灣文化源流與文化類型的問題，其間也涉及許多自然條件的認識、分析與理解。而此一理解無法脫離 18 世紀以降由歐洲發展出來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的知識背景。本專號最後一篇論文即在討論 19 世紀中葉歐美自然史的流變，表面上看，這篇由洪廣冀執筆的〈拼裝的科學革命——以美國第一回達爾文爭議為中心〉，標題與本專號「從帝大到臺大」的關係最淺，然而他所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的問題，卻能將臺北帝國大學學術史的時空及主題擴展到前人未曾觸及的範圍。本文主軸之一是 19 世紀美國自然史學者格雷（Asa Gray, 1801-1888）與其哈佛大學的同事阿格西（Louis Agassiz, 1807-1873）之間有關物種一元或多元起源的論爭，爭議的內容之一則與日本有密切關係。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日本的諸多植物相，因日耳曼人西博爾德（Philipp Franz Balthasar von Siebold, 1796-1866）的調查和出版植物圖譜，而在歐美聲名大噪。美國一方面基於與日本同緯度可能有相似生物相的好奇，另一方面基於試圖尋找過往東、西貿易熾手品可在美洲大陸栽種的商業利益，以及擴展海上捕鯨事業，在政府支持下，於 1846-1856 年間分別出動了 3 支探險隊，有系統地調查白令海峽、北太平洋及中國海域。在商業利益之外，美國的自然史學者對於日本與北美同緯度且有相似的植物相也深感好奇和困惑：如何解釋屬於同種的個體，為何一部分在東北亞，另一部分出現在東北美，且兩地之間看不到同種個體的分布？這個被稱為「北美－東亞隔離分布」的疑問，衍生出物種起源的「一源論」與「多源論」的爭辯。阿格西從「多源論」出發，認為相近或相似物種會在多個類似環境條件中被造物者創造出來；然而「一源論」則主張世上物種只有單一起源，物種分布是生物遷徙與擴散的結果，兩者立論雖均源出聖經，但雙方解讀起源的角度卻頗不相同。格雷不同意阿格西的論點，但沒有證據反駁。格雷藉助北太平洋探險隊中著名的職業植物採集者萊特（Charles Wright, 1811-1885）收集到的標本，加上他與達爾文的論學並受其物種變異的演化觀影響，使得他和萊特得以提出反駁阿格西多源論的堅實證據。

洪廣冀的目標不在以中文撰寫格雷的科學家偉人傳，相反的，他有意「去名人化」，將參與這場論辯的主角，擴增到論辯能夠成立的各種資源調度與機緣配合，包括藉商業利益與資源調查之便而得以掌握跨區域的生物地理資訊、隱姓埋名卻舉足輕重的職業植物調查者、探險隊在東亞遭逢各種意外狀況對標本採集完整性的衝擊，以及調查結果能被剛剛發軔的科學博物館有系統而完整收藏。放到更大的歷史場景來看，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場論辯反映了 18 世紀至 19 世紀前半葉全球物件與思想的廣域流通與碰撞。透過「去名人化」而且頗富臨場感的細緻描述，洪廣冀試圖以「拼裝觀」（assemblage thinking）重新梳理這場論辯，亦即打破有如史詩與洞燭機先的「科學『革命』」論，而是以更貼近原有歷史場景，將行動者放回原有的脈絡，才能看到環繞在英雄式科學人物周邊，影響其行動的各種條件，以及行動者如何取用並拼裝近身所能獲得的資源，發展一套狀似合理且非無懈可擊的論證，也正因非無懈可擊與拼裝，科學知識的進展才會有層出不窮需要重新檢證的縫隙。

四、時空擴張、資源拼裝、拆解系統

拼裝的視角可以讓我們回過頭來檢視百餘年來大學的學科體制與學術發展的互動關係，也可用以思索戰後初期兩種教育體制的筍接過程。從體制的物質生成條件來看，洪廣冀辨析了自然史研究能成為「科學」的物質條件包括：擁有數量龐大的標本，以為斷定其是否為特有種；使得世界各國植物學者，均能透過標本庫的比對，判定植物是否為新種。因而，收藏保存這些龐大標本的機構（博物館、大學、圖書館和檔案館）以及有意願及財源支持廣大範圍的生物調查（伴隨著將生物轉換為可控制的龐大經濟資源的野心）乃應運而生。這也是現代大學及研究體系得以成為知識生產基地的重要因素。從學科發展的方法條件來看，調查作為系統知識收集「田野科學」的重要性，在本專號的 3 篇文章中都清晰可見：不論是南洋史研究中的史料調查、考古學的遺址調查與挖掘和自然史的田野考察，「調查」（investigation）實是形成近代系統性的科學知識（*Wissenschaft*）的重要步驟。各種調查所得，文字資料進入圖書館，非文字資料進入博物館，並以一逐漸發展的分類體系加以歸類、保存、建檔，成為生產近代知識的重要原料來源。然而，拼裝觀正是要反思這看似精密細緻卻掩蓋知識原料如何被生產的複雜脈絡，進一步認識知識生成的各種可測與不可測的機緣，才能將視為理所當然的知識生成，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可被挑戰、可被拆解與再拼裝的新視野。因此，如何重新梳理大學擁有的各種物件圖儀的收藏脈絡，以及如何將現在的學科分際放回到原來逐漸生成的過程，以便理解戰後體制接收過程中拆解舊制並以手邊可用的有限資源拼裝新體制，實是日後重探史學邊界以及梳理知識系譜的重要基礎工作。

調查工作不僅只單純用於學術研究，近代國家也往往運用這類調查來掌握民情、控制資源，而近代大學體制既是發展這個調查技藝的單位，也是外在政府與產業希冀合作、取用調查技藝的資源庫。放在帝國擴張的脈絡下來看，帝國擴張同時也帶來對新空間地域的好奇和理解，因而大學成為發掘、系統性整理資訊、訓練專業人才、提供官僚養成以及物資轉換為資源最重要的知識與技術生產基地。本專號所述臺北帝大南洋史研究即為此一空間擴張下的新產物，而此一時期考古學及人類學也因帝國擴張而得以進行跨國的文化比較。日本在轉化此西方知識制度時，新創出了「東洋學」，而領有臺灣則又開創「南洋學」的範域。在此範域中，面向亞洲與西方世界競逐的歷史，遂成為「南洋交涉／交通史」要考察的對象，同時為在東南亞的日本人給予歷史位置。戰後臺灣史學界去殖民化的過程，也是臺灣與東南亞史逐漸脫節的過程，直到 1990 年代才又復返。如前所述，這個離而復返的過程中，將南洋史知識存續下來的，是制度之外曹永和與岩生成一的私淑傳承。如同吳密察所觀察的，戰後學院歷史學帶有「官學」的性格，[11]戰前戰後東南亞史的傳承在此一學院性格之外，或可顯示學院內／外的知識流通，是吾人反思史學邊界另一值得注意的方向。

空間擴張所接觸的大量新異物種在歐美衝擊了基督教創世神話，使得原有的物種起源受到很大的挑戰，一源與多源的爭辯，不只表現在物種起源，作為物種之一的人類及其所創造的文明，也被捲入此一源／多源之爭中。本專號中國分直一整理戰前至戰後初期的考古學成果，實也

11 吳密察，〈植民地大學とその戰後〉，收入吳密察、黃英哲、垂水千恵編，《記憶する台湾：帝国との相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会，2005），頁 3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此 19 世紀以來一源／多源的論爭有關，擴大來看，戰前日本及中國的考古學都致力在回應「人種／文明西來說」，極力想在亞洲找到自身文明起源的證據。「東洋」、「南洋」儘管背後具有日本「帝國」的新空間論述意涵，但卻也是跨越當時民族國家框架的空間觀點。本專號 3 篇論文的另一共通點，即在於重訪這些學者在跨民族國家空間單位中思索學問空間界線的初步成果。面對已然成形的全球化環境，臺灣史學研究如何在各種國族空間之上，思索百餘年來區域空間不斷重整對史學知識空間範域變動的影響，也是日後值得注意的面向。

19 世紀自然史的探究，不僅瓦解創世神話，也同時帶來新的地球時間的認知，地質學與考古學為自然界的歷史時間加上了數十數百萬年的單位，因而也衝擊了歷史學既有的時間範域。[12]在學科日漸專業分化的過程中，歷史學愈集中於有文字記載以後的人事活動，因而在此之外的事物被視為考古學與人類學的領域。戰後考古學由歷史系分出獨立成系，可謂此學科分化的軌跡。唯當我們要回溯戰前學術變遷的過程時，似宜跳脫當下學科的界域，才能較貼近的理解彼時知識系譜的內涵。換言之，重探史學邊界的過程中，應該也要思考如何將戰前考古學、人類學及 19 世紀自然史納入我們理解與考察的範圍。本專號的 3 篇論文，也是這個重探邊界的初步成果。

本專號 3 篇論文還有一些看似細微卻彼此關聯而有待日後進一步探尋的課題，也有一些正待出場的歷史人物，隱身在目前 3 篇論文搭建的舞台後。首先，洪廣冀所說的北美第一回達爾文爭議發生的地點：哈佛大學，實為美國考古學及人類學發展的重鎮。擔任臺北帝大「土俗學・人種學」講座教授的移川子之藏，即是受業於哈佛大學的 Ronald Burrage Dixon，Dixon 是著名的美國人類學者 Franz Boas（1858-1942）的大弟子。如果再往上溯，奠立哈佛大學人類學發展的靈魂人物，即為格雷及阿格

12 有關地質學對近代歷史學時間觀念的重大影響，可參考 Martin J. S. Rudwick, *Earth's Deep History: How It Was Discovered and Why It Matter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西。他們從 1830 至 1870 年代任教於哈佛，並於 1866 年成立 Peabody Museum of American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這座博物館成為支撐哈佛人類學及考古研究最重要的資產之一。[13]移川子之藏和國分直一在臺北帝大進行的原住民調查研究，在多大層面上延續了美國學界的一源／多源之爭？或者土俗學・人種學研究室要對話的對象，是美國、歐洲的學者，還是他們在日本的同儕？同一時期現代中國的考古學同樣出現一源／多源起源的爭辯，從這個學術傳承、學術網絡和學術對話來看，有關臺北帝大及戰後臺大在自然史、人類學和歷史學中的國際學術系譜，還有太多需要我們重新挖掘整理的線索。

這個國際學術系譜的名單中，有一位與格雷和臺灣都有關係的人物，就是畢業於札幌農學校、獲得哈佛博士的宮部金吾（1860-1951）。他原本是洪廣冀也打算寫進論文的人物，唯因截稿時限，只能待來日。宮部 1889 年回到札幌農學校任教，訓練出一大批農業技術人才，並且在殖民地臺灣推動農業變革。他們的知識背景中，有多少後格雷時代美國自然史與農學的影子，有待進一步梳理。目前為止，有關札幌農學校與臺灣農業發展的研究成果豐富，在制度、組織、人事、人際網絡（札幌系）的討論已相當多，[14]然而，上述國際知識流通的系譜則仍有待更深入的梳理，而此一梳理必須結合農學、生命科學、自然史等跨學科的知識。[15]這也是本專號試圖透過重探史學邊界時所寄望的新方向。在面臨全球氣

13 參考 David L. Browman & Stephen Williams, *Anthropology at Harvard: A Biographical History, 1790-1940* (Cambridge Mass.: Peabody Museum Press, 2013), pp. 23-46.

14 代表性的作品為吳文星，〈札幌農學校畢業生與臺灣近代糖業研究——以臺灣總督府糖業試驗場技師技手為中心〉，《臺灣學研究》第 6 期（2008 年 12 月，臺北），頁 1-25。

15 實際上這種跨學科的活動，在臺北帝大土俗學・人種學研究室所組成的「南方土俗學會」中即可得見，此學會集結了社會學的岡田謙、解剖學的金関丈夫、語言學的小川亨和淺井惠倫、農業經濟學的奧田彧和考古學的國分直一，對比同屬殖民地的朝鮮京城大學「宗教及社會學教室」缺乏跨域合作而言，實為活潑而鮮明的學術社群。參見全京秀著，太田心平譯，〈植民地の帝国大学にをける人類学的研究：京城帝国大学と台北帝国大学の比較〉，收入岸本美緒編，《岩波講座・「帝国」日本の学知（第 3 巻）：東洋学の磁場》（東京：岩波書店，2006），頁 99-1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候變遷衝擊農業糧食生產及人類維生物資的 21 世紀，歷史學實有必要將人放回到總體環境下思考彼此的互動，以及人的長時段活動對環境的影響與衝擊。

實際上，「學海無涯」雖是老生常談，200 年來藉由大學所建立的學科體制卻也製造出各式各樣的「邊界」。知識的邊界永遠都會隨著時代而變，但學科體制卻可能因制度的「依賴路徑」而僵固，此乃吾人需要不斷反思知識、制度與環境之間辯證關係的理由。放眼世界大學的歷史，19 世紀末葉以降在亞洲成立的大學，多半是殖民地大學（如新加坡、香港、澳洲、菲律賓），[16]只有日本及中國是在非殖民體制下，以自身需要並綜合歐美體制而建立的大學系統。臺大既承繼了來自日本殖民地大學的體制，也繼受了戰後來自中國的高教制度，更受戰後美國向全球輸出美式大學體制的影響，呈現出極為多樣而豐富的融合內涵，它表現在本專號論文中描述的南洋史的中挫與考古學的承轉，而現有的其他研究成果則正陸續挖掘理農學部和醫學部在戰後傳承的系譜。今年（2018）為臺大成立 90 年，在即將邁入百年之前，回思戰前日本帝國大學體制與戰後中華民國帶入新大學體制，藉此重詮重評制度與現下環境和未來發展的關係，實屬迎向百年臺大需要開啟的工作，而此一工作也必須放在反省臺灣高等教育的大脈絡下進行，在此大脈絡下仍有很多課題需要學界共同探索，本專號只是邁出此探索的一小步。

（責任編輯：石昇烜　校對：李　頎　洪麗崴）

16 Eric Ashby, *Universities: British, Indian, African: A Study in the Ecology of Higher Education*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6); Philip G. Altbach and Viswanathan Selvaratnam, eds., *From Dependence to Aut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Asian Universities*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